

呐喊

之后的

文化沉思

——重新认识道器并重的中华元文化

刘明武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呐喊之后的文化沉思

——重新认识道器并重的中华元文化

刘明武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呐喊之后的文化沉思:重新认识道器并重的中华元文化 / 刘明武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1

ISBN 7-80148-976-4

I. 呐... II. 刘...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9771 号

呐喊之后的文化沉思

——重新认识道器并重的中华元文化

刘明武 / 著

责任编辑: 于九涛

封面设计: 刘守卫

版式设计: 张 芳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 100005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55270449

电子邮箱: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经 销: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 010-65513628 65512133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00 × 1230 1/32

印 张: 9.12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通过销售热线联系调换。

序

以思为经 以变为纬

□ 阎纯德

刘明武在2003年由中华书局同时出版了《寻找元文化》、《中华元典智慧发微》和《打扫孔家殿》三本文集，这本《呐喊之后的文化沉思》文集也即将付梓出版。

只管潜心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其实其收获往往是丰厚的，因为这是智慧和汗水的必然回报。

刘明武是工程师，是科学家，也是探讨文化的学者。我乐意为他的著作写序，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研究的深度及与社会、人生结合的“密度”——他的研究是形而上，而着眼点却是形而下。他的一切研究，最终都是为了回报社会，回归人类，而不是纸上谈兵。他的文章让人信服，甚至令人折服。

在我看来他的这本著作概括起来有以下诸点特色和价值值得说明：

其一，刘明武对文化的研究是独特的，首先是不与别人雷同。我说的雷同不是说研究的对象，而是指研究的内容和得出的结论。他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用智慧研究学问，每一篇文章都有创见，即思别人之所未思，言别人之所未言。读他的文章，扑面而来的的是一个“新”字。请看 he 以下文章的题目：《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元点智慧再认识：试论太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之间的差异》、《在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华文化》、《象：文字之外的道理》、《不是什么，什么都是》、《育人与育才》、《天文·天气·天灾》、《天体·人体·经络》等。这些文章，一篇一个问题，既没有雷同别人，也没有雷同自己。

从《中国文化研究》的创办到退出主编的岗位，前后近十年，若问我最喜欢与最害怕的文章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最喜欢新意扑面的文章，最害怕“炒剩饭”的平平之作。刘明武的文章属于编辑乐意发表的文章。《中国文化研究》是季刊，但我曾在一年之内发过他两篇文章，而且是和张岱年、陈立夫先生的文章放在一起，这对于一位刚刚入道尚无“文名”的作者来说，其待遇是破格破例的。《东方》是月刊，一年之内发过他十篇文章，这更是破例的。据我所知，《中州学刊》、《人文杂志》都为他破过例。2004年《中华读书报·学术版》以整个篇幅连续发表了他的《读书读出的几个困惑》之一、之二、之三，文章还被光明、新华、国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几十家网站所转载，有百万人通过报纸和网上点击读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不仅平民赞扬，连一些学者和教授也赞不绝口。一个并没有受过文科正规教育的工程师，一个本来是文化研究的“门外汉”，进入文化研究领域后所研究的问题大多是前人与学者没有

注意到的，写出的文章大多具有崭新的意义。在到处散发着学术腐败之气的今天，刘明武却为我们的学界保留了一点可贵的元气。这也是我乐意为之写序的原因之一。

其次，刘明武的研究方法有独到之处。一般人研究《周易》是研究《周易》本身，是“我”所理解的《周易》，或总结前人理解的《周易》。刘明武研究《周易》，是在世界经典对比中研究《周易》。他同时把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几部重要经典，例如印度的《奥义书》、希伯来人的《圣经》、释迦牟尼的经典、古希腊神话与古希腊哲学同时摆在桌上，对照前几页上的内容，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祖先，在能够提出问题的時候，最早提出的竟是同一问题，即天地万物从何而来？最初的一男一女从何而来？解答同一问题，不同的民族按照自己的理解交出了答案。解答天地万物的起源，《奥义书》的答案是一个梵（宇宙精神），《圣经》的答案是一个万能之神，释迦牟尼的答案是“缘起性空”四个字，古希腊神话同样用神作答案，古希腊三代哲学家把水、气、火、土这些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当做了万物的本源。惟有我中华先贤是用阴阳两爻组成卦做出了答案。卦，是表达宇宙发生论的。算命先生所算的卦早已偏离了卦的本义。解答天地万物产生的方式，《奥义书》采用的是步步生产式，即梵生空，空生风，风生火，火生水，水生地。释迦牟尼采用的是“内外因合和”生成式。因是内因，缘是外因。万法即万物诞生于内因与外缘两种因素的合和之中。《圣经》采用的是命令式，即“上帝说‘要有什么’，于是有了什么。”天地、日月、光明与黑暗、陆地与海水、飞禽与走兽、动物与植物都是在上帝的指令下瞬间形成的。《周易》采用的是阴阳裂变式，即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文字中的表述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对比之下可以知道，我

们源头的中华文化并不是落后于人的文化。刘明武在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结论。

《圣经》中有丰美的伊甸园，园里什么都有，亚当与夏娃不需要动手动脑就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华大地上没有神，所以也没有丰美的伊甸园，一切都必须靠人去创造。伏羲氏（又称包牺氏）结出捕鱼狩猎的网罟；神农氏揉出耕地的耒耜，创建交易市场；黄帝、尧、舜制衣裳，造舟车，建宫室，发明御敌的弓箭，创造加工粮食的臼杵……要想过上亚当、夏娃那样的生活，伏羲氏们必须自己动手动脑。对比之下可以知道，源头的中华民族并不是落后于人的民族。刘明武在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结论。

《文心雕龙》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周易·系辞下》曰：“包羲氏……始作八卦。”如果以太极、八卦为文化源头的话，刘明武认为，中华文化是源于自然的文化，因为伏羲氏作八卦时，仰观的是天文，俯察的是地理，仰观俯察中没有见到任何神秘的东西。《周礼》上说，中华大地曾经有三个八卦，刘明武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源头的文化是包容的文化。同样是八卦，何以有三个？答曰：同一问题允许有三种表达形式也。同一问题允许有三种表达方法，这说明源头的文化是能包容不同认识的文化。三个八卦，史传的三个作者——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在时间上有先有后，这一事实告诉后人，中华先贤所开创的文化是允许后人在前人基础上前进的文化，是允许后人超越前人的文化。能包容不同认识，又允许后人超越前人，刘明武所研究的源头的中华文化，的确是可爱的文化。

众所周知，100年来的文化批判其主要结论有两个：一是“文化不如人，事事不如人”；一是“文化比人强，小脚、辫子也优秀”。

刘明武没有受这两种结论的限制，他的研究证明，中华大地上存在源文化、流文化两种文化。源文化孕育出的是文明强大、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民族，流文化孕育出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源文化并不输于人，流文化的确输于人。刘明武敬重前人，但不局限于前人。文集定名为《呐喊之后的文化沉思》，就是希望在前人未竟事业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找出那个曾经使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的文化。刘明武在对比中冷静、理智地研究文化，说有道理的话，讲有依据的事，文章中避免了激动的成分，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三，刘明武最终寻找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刘明武认为，一种文化背后，隐藏着创造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他在《天体·人体·经络》一文中写道：“《圣经》第一页上，最先出现的是神。《周易》第一页上，最先出现的是卦。神会说话，卦却无言。神是人的创造者，而卦却是人的创造物。崇拜神与重视人，这是不是两种思维方式？”

“我们祖先有这个，有那个；有这样，有那样。”以往的文化研究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种论调。“有，凭什么有？早先有，后来为什么没有？”这是刘明武所追溯的问题。他在源头的文化里发现了一种“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刘明武在《天体·人体·经络》中写道：“在生生之物的基础上追溯出生生之源，然后站在生生之源的高度上去认识所有的生生之物，站在生生之源的高度上去进行文化、器具的发现创造，这就是中华元文化中所隐藏的思维方式。”道为生生之源，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可称为“以道论之”。太极、八卦、六十四卦均产生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网罟、耒耜、市场、衣裳、臼杵、宫室、弓矢、书契均产生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被诸子百家所继承。在《礼记》中可以看出，儒家以道论礼，以道论天下为公。在《道德经》、《庄子》里

可以看出，道家以道论德，以道论政，以道论逍遥人生。在《孙子兵法》里，兵家以道论兵。在《周髀算经》里，天文学家以道论天文，以道论勾股弦。在《黄帝内经》里，医学家以道论医理、医术。在《庄子·养生主》里可以看出，庖丁以道论解牛之技，解牛之技又被文惠君转化为养生术。在《庄子·达生》里，驼背老人以道论捉蝉之技，孔子又从捉蝉之技里悟出了学习之道。以道论之，是中华元文化的精髓，是儒道两家文化的精髓。道，又被儒道两家简洁为“一”。以道论之与以一论之具有同等意义。在符合道理亦即和谐自然、和谐社会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启发人们在各个领域内提出新问题，是以道论之这种思维方式的第一特征。以道论之，论出了早期中华大地上所出现的、领先于世界的灿烂文化。

西汉以后，出现了“以纲论之”即“以君论之”的思维方式。君，隔断了人与道的直接沟通，隔断了人与天地的直接沟通。“道如何，人如何”与“天地如何，人如何”的做人公式，在“三纲”那里变成了“君如何，人如何”。“以纲论之”倡导的是绝对服从，倡导的是“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自从“三纲”推行之后，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一步步萎缩，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出现像《周易》、《尚书》、《诗经》这样的经典，再也没有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到了明清之际，中华民族的能力只是体现在整理经典上，而再也没有能力创造经典了。以君论之，禁锢了整个民族的创造灵性。在“纲”的禁锢下，中华民族丧失了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的能力。落后挨打的命运，产生在以君论之的思维方式之下。刘明武的这个认识，我认为有道理。

以是论之或以真论之，刘明武认为，这是现代西方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重视研究生生之物，不顾生生之源，所

以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在人类利用生生之物的同时，危害了生生之物的父母——天地。季羨林先生撰文《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对危害自然的现代西方文化做出了否定性批评。如何拯救？刘明武认为，一切发明创造必须置于道理之下。道器转化，是刘明武文化研究的特色。刘明武以道论器，以道论技，以道论术，论出了道在形下各个层面上的实用性，论出了天文与天灾之间的源流关系，论出了天体与人体之间的源流关系……研究道，致于用。由道出发，可以提出很多很多问题，如庄子所言“通于一而万事毕”。由道出发演化出来的问题，犹如树叶不会危害树根那样，不可能回头再危害道——生生之源。刘明武的研究，让人们看到了东方文化的魅力与生命力。

刘明武认为，以太极、八卦为源头的中华文化是崇尚“变”的文化。《周易·系辞下》曰：“唯变所适。”又曰：“变则通。”这与《圣经》崇尚的“信”是有差别的。变，须有一个参照坐标，这个参照坐标就是“道”。《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道器转化为变。道在何处？庄子说，道在天地中，亦在小草中，亦在屎溺中。一切都可以变，但必须以道为参照坐标，即以和谐天地万物而不危害天地万物为前提。所以，变之前需要三个标准深而思之，即“该不该”，“善不善”，“美不美”。刘明武主张，在“民以食为天”之后应追加一句话，即“以思为经，以变为纬”。在这里，“食”“思”“变”三个字处于同一等高线上。如果“食”的问题解决之后，人们不断地思，不断地变，那么我们还会落后他人吗？这是刘明武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

2005年4月16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以思为经 以变为纬 (阎纯德)
第一辑	读书读出的困惑
	读近代、现代书读出的困惑 (二十三则) /2
	读古代书读出的困惑 (十九则) /35
	读外国书读出的困惑 (六则) /78
第二辑	重新认识道器并重的中华元文化
	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92
	元点智慧再认识 /109
	象：文字之外的道理 /125
	不是什么，什么都是 /139
	在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华文化 /159
	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差异 /177
	育人与育才 /197
	站在中医文化立场上看“非典” /212
	天文·天气·天灾 /220
	天体·人体·经络 /239
跋	/262

第一輯

读书读出的困惑

读近代、现代书读出的困惑

二十三则

一

康有为先生在《新学伪经考》中把“古文经学”宣布为东汉刘歆的伪作，这在戊戌运动时期造成了惊天动地的轰动。后来，梁启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并没有区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照样引用康有为先生所否定的经典。康、梁都是大家，又有师承关系，两个人谁对谁错呢？进而言之，康、梁两位老先生对文化的态度谁对谁错呢？

二

康有为先生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很多说是能使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张，其中之一就是打破夫妻制度——“凡男女相悦者，则立约以三月为期，期满之后，任其更与他人立约。”康老先生认为，

民族复兴的捷径在于首先破坏家庭私有制，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经常地、不断地更换妻子或丈夫。

康老先生一直以大儒自居，在儒家文化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之道是从处理好夫妻关系开始的。《礼记·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又引《诗》：“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礼记》中多次出现“爱天下人先爱妻子”的主张。《周易·序卦》：“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阅读儒家典籍，找不到“君子三个月更换一次妻子”的道理。从《周易》到《尚书》，从《诗经》到孔孟，一直是以小家之道而论天下之道。家道正而后天下定，家庭安定首先应体现在稳定的夫妻关系上。按照康老先生的划分，“古文经学”为假，但《礼记·中庸》应该为真，儒家并没有与康有为相同相似的主张。打儒家的旗号，宣扬与儒家相反的主张，算不算真的儒？

三

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赧伪古文，固不用说。即28篇‘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价值。”

在这个否定性结论之前，胡适先生对《孟子》做出了肯定性的结论：“《孟子》或是全真，或是全假（宋人疑《孟子》者甚多）。依我看来，大约是真的。”

如果《孟子》为真，那么胡适先生对《尚书》所下的结论应该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孟子》里面几十处引用了《尚书》，其中包括所谓的“梅赧伪古文”。数学允许等量代换，如果a等于b，b等于c，那么a就等于c。同理，如果《孟子》为真，因为孟子大量

引用了《尚书》，由此可以证明《尚书》是有信史价值的。实际上，《礼记》、《论语》、《左传》、《墨子》、《国语》、《庄子》、《荀子》里都有《尚书》的出现，如果《尚书》没有“信史价值”，那么应该怎样评价上述典籍呢？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直是笔者的座右铭，那么胡先生研究中华文化时真的“小心求证”了吗？胡先生对中华文化的评价符合实际吗？

四

现代物理学表明，水在同一温度下不可能既形成蒸气，又形成固体之冰。化学实验证明，同一条件不可能造成一种物质的两种反应。在佛教因果论中，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一种因不可能产生两种果。在现实生活中，先进有先进的道理，落后有落后的理由。一种原因不可能同时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那么一种文化为何会孕育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华民族——一个文明而先进，一个落后又挨打？因此，把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归结在中华文化本身上，如此结论对吗？

五

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至今还没有结论。后人研究这场论战，关注的是双方的不同点。笔者关注的却是论战双方的共同点，即双方都认为一个“玄”字能够代表中华文化。

据《辞海》“玄学”条，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派“贵无”、一派“崇有”的哲学思潮。那么魏晋玄学能够代表中华文化吗？显然不能，因为魏晋之前已经有了诸子百家，已经有了儒道文化。

据《大辞典》“玄学”条，玄学指的是道家的玄妙之学。可是，老子论玄，既不“贵无”，也不“崇有”，论出的是有无一体。“无，

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道德经》开篇之处，老子指出玄的结构由无、有两部分所构成。玄融于有无一体之中，而非有无对立。玄为众妙之门，众妙之门为生门，这里正是天地万物的发源地。庄子论道，一论在天地之中，二论在小草之中，三论在砖头瓦块之中，最终论在屎尿之中。道玄物不玄，道玄人不玄。道，一不远物，二不远人，所以“贵无”、“崇有”相互对立的哲学思潮既不能代表中华文化，也不能代表有无一体为玄的道家文化。

再者，论玄的道家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中华文化。因为道家之外，还有儒家，诸子百家之前，中华文明已有 2500 年。

源头的中华文化即中华元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先说道。探讨天地起源是人类祖先的共同课题，同一个问题，不同民族作出了不同的答案。犹太人的祖先用一个万能的上帝、阿拉伯人的祖先用惟一的真主回答了天地起源问题。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把水、气、火、土这些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当做了万物的本源。释迦牟尼以“缘起性空”即内因之因与外因之缘两个条件解释了万物起源。惟有我中华先贤用抽象的一阴一阳解答了天地起源问题。阴阳先是以两爻形式出现的。文字出现之后，一阴一阳被界定为道。道为生之源。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万物生男女。道和上帝、真主一样是造物主，但前者是自然存在，而后者是具有人格意义的神灵。道和上帝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如是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如是说。道，既是宇宙观，又是人生观。

再说器。早期中华民族与西方其他民族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标志，那就是特别善于发明创造。西方的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神那里偷来的，中华大地上的火是人用智慧从木头中钻出来的。

《圣经》里的伊甸园是上帝恩赐的，中华大地的草木屋是人构筑起来的。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与文字记载里出现的是一系列有关发明创造的人和事：“女娲补天”，“钻木取火”，“构木为巢”；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发明网罟、耒耜、衣裳、车船、臼杵、宫室、弓矢，嫫祖培育桑蚕，后稷培育五谷……《圣经》中的万能之神没有降福于中华大地，所以，幸福生活必须由中华民族来自己创造。创造幸福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用力，二是力智结合。中华先贤走的是后一条路。他们用智慧创造出先进的器具，再用器具促进生产、改善生活。中华先贤把一切先进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自卫武器简称为器。商朝之前的贤哲迟任就相信：“人是旧的好，器是新的好”。《周易·系辞传》中把发明创造器具与天地日月的功劳相并列，并记载了“尚象制器”的系统理论。《圣经》中的上帝反对人的发明创造，夏娃用无花果的树叶发明裙子，成了至今也无法赎清的原罪。据《周易·系辞下》记载，衣裳是黄帝发明的。在中华大地上，人们穿衣裳是一件文明天下的大好事。道不但支持人的发明，还可以启迪人们在各个领域和任何时期进行创造。《周易·系辞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个论断告诉子孙，道、器之间是可以转化的。道能启迪人的发明创造，是因为道体现在两种象——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中。形象之象是天地万物之形象，抽象之象即太极、八卦与六十四卦之图像。形象之象生动活泼、日新月异，抽象之象简易、深邃而博大，所以两种象均可以启迪发明创造的灵性。早期中华大地上出现的重大创造大多与阴阳、八卦有关，如天文学、礼乐、中医学、军事学、建筑学、围棋、炼丹术等。道与器在现象上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实质上乃源流关系。道处生技，道处生术，道处